

# 我的入党故事

● 陈家俊

1977年初,我从技校毕业分配进了上钢十厂四车间。车间里分甲、乙、丙三班倒,作为一个技校毕业的技术工人我加入了丙班值班电工的队伍。

当年的钢铁厂,马达隆隆,汽笛声声,热浪滚滚,生产线上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在操作,一条条钢带在空中飞舞,每个班都在开展劳动竞赛,班吨位产量、成材率等各项指标都成为大家关心的大事,小班支数节节攀高。

有一天,我挎着“盒子炮”(工人们戏称的电工袋)在车间巡查,轧机发出异常声音,一条钢带叠钢了,超负荷的电流迫使主电机跳闸,我飞奔进主电室,与其他值班的同事,紧急处理完故障。然后来到轧机旁,看调整工和轧钢工段的同志们处理事故,有一个瘦小的工人跑前跑后大声的指挥着行车吊起报废的钢带,我不禁问身边的工人,他是谁?那工人笑呵呵地说:“他是我们的值班主任,局优秀共产党员小张。”

“优秀共产党员”,这个光荣的名字从此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中,我在想,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跟我上,是我从电影里看到的,和平建设年代的共产党员在大生产中也是这样的冲锋在前啊。

从此,每每我看到冲向危险场合的,事后别人告诉我,他是党员。“冲锋在前,享受在后”这一朴素的想法深深铭记在我的脑子里,我暗暗下决心,要向党员学习,积极争取入党。

不久,由于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出色,我被大家选举为丙班团支书。从此,除了我们设备工段长是我工作的直接领导外,班党支书小徐成为我向党组织靠拢

的引路人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从此,我会提前半小时上班,进车间巡视设备运行状况,值班时我在车间里前后奔走,哪里出现电器事故,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哪,慢慢地我被大家所认可。

有一天支书小徐找我说:“小陈,下周我们班是中班,周四晚上有中国队的一场球,好几个工段长来反映,各工段有好多青工想调休,你是否动员一下团员骨干能留下?”我一听心里想,我也想调休呢,我特崇拜古广明的沉底传中了。但是我看着徐书记殷切的笑脸,心里的话早就飞到爪哇国去了,我大声地回答:“徐书记,坚决完成任务!”

到了中国队比赛的那天,团员青年们不但都来了,而且一个顶两,把缺人岗位都顶了下来。

第二天车间党总支书记老王对我说:“小陈,你成立一个青年突击队吧,做一面红旗和几件汗背心,印上青年突击队金黄色大字,让团员青年当好助手和后备军。”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青工高唱着《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代》歌曲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在我担任车间团总支书记的日子里,哪里有艰苦的工作,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

1982年党的生日,我凝视着鲜红的党旗,举起右手,庄严地向党宣誓。

# 不会放弃你

● 章慧敏

冬的韵味显现时,我来到了位于青浦的上海市第三看守所。这里是上海唯一一所集中关押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地方,民警们每天都将面临常人无法体会的压力和“险情”。

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这绝非危言耸听——5月的一天,看守所送进来一名因为偷窃而被刑事拘留的“涉艾人员”,在为他做例行检查时大家闻到一股弥漫在收押室里的浓烈臭味。

我问民警,真有那么臭吗?他回答说,那臭味就像一头被丢弃的动物尸体。

我看到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,在对“涉艾人员”教育谈话时相互间是“零距离”接触的,这是为了让它们不感到被歧视和排斥。然而,风险却也显而易见。那天,一名“涉艾人员”在监区大喊大叫,这种现象在一个本应有秩序的地方是不允许发生的。值班民警小施打开铁门进行制止。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,那人像头野兽似地朝小施扑来,一股强烈的惯性将他压在了床板上,那人用头狠命地撞向小施的面孔……

当民警将男子控制住后,有人惊恐地发现小施的眼角和额头在流血!在场的人都明白健康人的血和艾滋病人的血交融在一起意味着什么?小施被“职业暴露”了!在半年的等待期里,小施只能吃药,再吃药。哪怕这种药对肝脏的损伤很严重,然后就是验血,再验血,直到有一张确定他为“清白”的报告出来。

不管“涉艾人员”犯了什么罪,但在第三看守所民警的眼里,他们是病人,对他们的治疗和照料是一种责任。正是这份真诚与善意触动了那些曾经扭曲的心灵,他们说:“我们得了艾滋病,连父母都嫌弃害怕,可你们却不放弃我们,我们服了。”



■ 放飞(摄影)

计小江

# 桂苓苑

刊头书法 瞿国平

红色弄堂

(节选)

作者 张晓栋

HONG SE LONG TANG

广东商人涌入上海,是早于五口通商的。及至19世纪50年代的小刀会,主角几乎都是广东人和福建人,他们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进入20世纪,上海市中心建起的商业巨构,如先施百货公司、永安百货公司,无不是广东人留下的杰作,而他们的聚居区则在原来的美租界、后来的公共租界与华界交错的虹口四川北路一带。四川北路旧时称北四川路,南起今苏州河四川路桥,向北一直通到江湾路虹口公园(今鲁迅公园),门牌号在2000个以上,足见此路绵延之长。广东人在北四川路上的影子随处可见,那儿的粤戏院、粤菜馆、粤茶楼都是上海极有特色的好去处。

随着这一带热闹起来,有实力的公司也乐意来此圈地投资。1925年,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在今四川北路1953弄至1973弄之间建造了永安里,作为中高级职员的宿舍。永安里已经出了租界,在华界范围内。这是一条规划得十分规整的弄堂,一头通四川北路,有3个弄口,分别为四川北路1953弄、1963弄、1973弄;另一头通多伦路,有4个弄口,分别为多伦路153弄、163弄、173弄、183弄,后三个

弄口与四川北路弄口对应。永安里的建筑是传统的砖木结构,细节处都有小装饰,还带有小花园,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级的住宅区。

1928年,正在亨昌里参与《布尔什维克》编辑工作的黄玠然接到党组织布置的新任务——在永安里135号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处,这里将成为党中央开会接头或阅文的机关之一。作为掩护,除了黄玠然夫妇,黄玠然的父母也住了进去。同年秋天,张纪恩和张越霞接替黄玠然夫妇入住永安里135号。张纪恩于1925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不久即转为党员。1928年7月,他与张越霞从杭州一起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,同时组成了小家庭。张纪恩夫妇主要负责油印文件、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的工作。那时,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,只有生活费。张纪恩每月可领15枚银元,张越霞可领5枚银元。

陈独秀、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项英、彭湃、罗登贤、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到永安里135号开会、阅读文件、指导工作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,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许白昊在1930年6月与陈乔年等同时牺牲后,陈独秀忍着丧子之痛,还来这里慰问许白昊的妻子

秦怡君。

永安里135号直对着四川北路1973弄,在弄中较居中,临第三条横弄。不为人知的是,永安里之中还有一个绝密场所,哪怕是党内的高层领导都很少知道,就在与135号隔着一条弄堂的44号。永安里44号在四川北路1953弄的弄口处,虽与135号隔着一条弄堂,但弄内相通,不过,按照一般的行走习惯,两户的人住者很难相遇。

永安里44号是一个秘密藏身处,不到紧急时刻不能起用,更是无人知晓。一般认为,这个藏身处是在1927年秋冬中央特科建立时设置的。当时,永安里44号住着周恩来的堂弟周恩来一家,周恩来的父亲也在这里居住过。早先,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定来过这里,但因为是绝密地点,所以肯定不会经常来。1931年4月,中共特科的重量级人物顾顺章叛变,紧接着的6月,向忠发也叛变,形势急转直下,周恩来难以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,于是,他和邓颖超来到永安里44号,陪着老人和孩子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。1931年12月,周恩来化装后从十六铺码头登上轮船,绕道南方进入苏区。

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尚存。

永安里,高级员工宿舍中传出革命强音

——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、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